

10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了新一年度的世界大学排名榜,在榜单上,北京大学位居第46名,这也是中国大陆的高校首次跻身前50名。新榜的发布再次燃起了大家对大学排行的关注。

而几天后,又有媒体报道,因“中国大学排名榜”而备受争议的武书连,在2012年第5期《高教评估与发展》杂志上发表论文,回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评价课题组对其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的质疑。

就像每年这个时候撩拨公众视线的诺贝尔奖一样,每年林林总总的大学排名榜也总会一年一年地牵动中国高

校敏感的神经,“虚火”的起伏波动总是引起几家欢喜几家愁。且不说这些排行榜的评价指标、参照体系是否能够公正、科学,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大学的神经何以如此敏感?如此依赖于这些五花八门的排行榜呢?大学的追求、大学的发展难道仅仅是为了争到排行榜的虚火吗?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华中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时讲到:“大学作为理性的堡垒,更需要反思”,要让学术自由、让学生自由发展成为永恒的追求,要在社会功利的喧嚣和躁动中保持冷静和清醒。而中国的大学,是否也应该在各种排行榜中保持冷静和清醒呢?

校长面对面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

医学教育必须是精英教育

本报记者 钟华

北京协和医学院坐落在北京市王府井,在游人如织的京城繁华之地,这座灰墙碧瓦的中式小院却显得格外朴素宁静。这座小院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100多年前,西方医学正是从这里走进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医学高等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曾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奇迹,也一直引领着中国医院教育发展的方向。如今,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健康状况。随着新的医学模式应运而生,医学教育是否也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在医患关系、医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的今天,我们的医学教育又必须有怎样的“中国特色”?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经常思考的问题。

医学人才应该是复合型多学科的人才

疾病是由某种生物学原因(一个病毒、一个细菌)引起的,医生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病毒杀掉。过去几十年来,这种把病人看成一种生物学现象的生物学医学模式,把医学机械化、简单化,忽略了人性的因素。

而随着传染病在人类死亡病例里面减低,以心血管、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人类健康的最主要杀手。这种慢性病成为现代医学的主要对象后,医学模式也从以前简单的生物学医学模式转变为以社会心理生物学医学模式,对医生也提出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要求。

“这些疾病的成因,既有生物学的发病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发病原因,更有社会学上的发病原因,这对医生的岗位要求、岗位能力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要求。医生必须要有宽厚的知识,必须有人对心理需求、情感的全面了解和认识,才能胜任岗位。”曾益新说,“我们的医学教育也必须适应这种医学模式的转变而进行改变。另外,医科确实与文科、理科不一样。医科既需要理科的理性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比如根据病人的症状,基于其他证据作一步步的推理,获得诊断而制定治疗方案。另一方面,从工作的需求来看,当好医生又需要高超的沟通艺术、活泼的气质,还需要有强烈的人文情怀,所以医科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的复合学科。”

1991年,美国的MCAT(医学院入学考试)就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增加了很多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考试内容。

曾益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有位老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在预科阶段的人文、心理、社会课程的侧重点应该是如何从病人及家属的角度看待医学;到了临床阶段,侧重点则应该是如何从医学的角度看待病人和家属。他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对人文课程的开设具有指导意义。目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学计划中已经开设了社会学的课程,正在制定的新的八年课程计划中也在考虑如何在预科及后续课程中把人文、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与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融合到整个8年的教育过程中去。



医学教育需要进一步规范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每年的60万医学毕业生中只有10万当医生,另外50万选择从事其他职业。一方面是社会对医生,尤其是优秀医生的需求量非常大;另一方面,却是医学人才大量“逃离”医学事业。这不得不让大家反思,中国的医学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

不可否认,这与近些年来中国高校,尤其是中国医科高校的扩招有很大关系。

“高进、优教、严出”的标准,三基(基本理念、基本技能、基本知识)三严(严格的要求、严格的态度、严格的作风)的传统,协和医学院的这些教学理念和作风影响了上个世纪中国的医学教育,被推广到了中国的医学教学体系中。

后来教育市场化,教育变成了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学校经费的获得取决于学生的数量,以至于许多医学院也大力扩招,有的临床医学专业每年招生达千人以上。但是,由于医学教育的特殊性,扩招导致的师生比变大,教学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使得很多学生参与不了规范的实验课和临床训练。而这让合格的医学人才培养成果大打折扣,于是出现大量医学毕业生从事非医学职业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当年整个大学教育规模扩招,让国民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大学教育的普及,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转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阶段性的,我们不能因此去否定过去的规模扩张,但现在要把质量放在更高的位

“要把高等教育的质量放在更高的位置,高等教育经过大规模的扩招后,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内涵建设、质量建设。

医学教育就是精英教育,也必须是精英教育。现在医生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对医生的要求注重医生必须有较高的素质,而我国也具有培养精英医生的总体能力和潜能。

置。高等教育经过大规模的扩招后,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内涵建设、质量建设。”曾益新介绍说,医学院的盲目、过度扩张也并非中国独特的现象,100年前美国也曾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当时,美国有100多所医学院校招生,招生素质参差不齐,起点不一,乱七八糟。直到上个世纪初,美国才下决心整顿医学教育,把招生的医学院校减至100所左右,对医学的招生起点和学制作了全面系统和规范的要求。

协和的定位是培养未来的医界领袖

“社会对优秀医生的需求量非常大,协和医学院理论上更有责任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医生。”曾益新强调,但是在协和,质量第一仍然是医学教学坚持的理念。在教学中,严格考虑各种资源与学生的比率,如师生比、教学资源等等。

“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目标,而协和的定位就是培养未来的医界领袖。”而对所谓的“医界领袖”,他认为,并不仅仅体现在行业职务、行政职务抑或卫生政策的参与力,而是每一名医学生身体里蕴藏的独特的行医理念、严谨的执业方式、不断创新的科学理念、高尚的医德医风,这些为社会和同行所称颂的行为,都将潜移默化地引领我国医学的发展。

目前,协和的师生比在国内也是极高的,如果只算基础学院和协和医院,基本上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再算上其他附属医院,师生比则更高。这样的设置也是完全参照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标准。事实上,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就

是按照国际标准来制定各种教学制度。

在曾益新看来,协和医学院对于现在高等医学界的意义,在于设定中国医学界的标准,引领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追求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很好的实践机会和操作机会,严格的过程要求等等,这些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做得到,但是大家都应该知道朝哪个方向努力。”当然,他也坦承,让全国的医学院都按协和的师生比和资源比来配置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一定非要达到三比一,把每年招两千本科生压缩到二三百,保证高质量也是有可能的”。

医学教育盲目扩张后产生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其严重性,现在明令禁止医学院扩招,原则上不再新建新的医学院。但中国的医学教育是定位于精英教育还是大众化教育?是小规模教育还是大众化教育?目前这些问题仍在讨论中。

而曾益新坚定地认为,医学教育就是精英教育,也必须是精英教育。一方面,现在医生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对医生的要求注重医生必须有较高的素质;另一方面,我国也具有培养精英医生的总体能力和潜能,中国的教学能力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评估医疗机构的需求量,根据社会的需求确定培养数量,严格设定最低标准,使教学资源得到良好运用。”

在教学中传递人文关怀

协和的医学教育,不仅在“高进、优教、严出”的每一个环节塑造和定义了精英,更体现在人才培养中对医学生的人文关怀的重视和培养中。

“尤其在医患矛盾突出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对病人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就显得特别必要。”曾益新介绍说,协和医学院人文方面的课程会更多一些,“我们有自己专门的社会科学系,并打算将其扩建成一个人文学院并进一步丰富它的内容。从人文、法律、心理学等更多层面设置课程内容。同时,也要关注医学生的心理需求。”在他看来,学生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人文关怀,才能把这种关怀传递到病人身上去。

在整个课程中把人文、科学的内容加进去,把人文的情怀贯穿到专业里,贯穿到8年的课程里。协和医学院还在学生四年级后的第一个暑假,把他们送到农村的乡镇卫生院生活一个月。让他们与乡村医生同吃同住同工作,其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中国基层的农民以及医务人员的生活状态、基层疾病的状态。还有一个环节是让学生在六年级的暑假到国外著名的医院学习四个星期,看看国外最好的医疗机构是如何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

“通过这两个环节,一个下基层,一个去国外,建立起学生对人文精神的切身感悟和体验。”曾益新说,“培养人文精神不在于对学生灌输了多么理念,而必须要有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他才会有一种自发的人文情怀。只有亲身经历了基层如此艰难的状态,才能建立起学生对中国社会基层的一种认识;只有有了认识和感悟后,对基层百姓穷困境遇的认知才能建立起来,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才会有落脚点。”

中国大学评论

南科大不要成为“舌尖上的南科大”

熊丙奇

2010年,朱清时校长在给学生和家的一封信中公开信中说:“参照香港科大建制的模式,一步到位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2011年,援助南科大的三名港科大的教授“出走”,朱清时校长也调整了南科大的定位,他说:“要把南科大办成加州理工大学一样的创新型高校。”而最近,朱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如果说远景的期望,我希望南科大要像斯坦福大学那样,不仅是高新技术的研究者,还要成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新京报》9月21日)

作为一所新创立的大学,在建校之初“摸索”学校的办学定位,这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对于南科大来说,不管是最初想“模仿”港科大,还是后来想成为“加州理工”和“斯坦福”,如果没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想都不要想。对于国外和境外大学,我国大学需要借鉴,但“拿来”的不是学校的外在,而应该是最基本的办学制度。

早在2007年,深圳市就提出将要主要借鉴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办学经验,力争通过15年左右的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这一提法,一直延续到2011年年初。深圳之所以选择港科大作为借鉴对象,一来地理距离近,二来港科大的快速崛起,符合国人对快速办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期待。本来,如果深圳能全力借鉴港科大的现代大学制度,排除阻力在南科大“落地”,南科大后来的诸多“风波”,基本上都不会发生——首先,深圳可借鉴香港当初举办港科大制订大学章程的模式,制订南科大的章程,明晰政府、学校的权责界限;其次,按照大学章程,组建代表广泛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的重大战略决策,包括公开遴选校长、确定学校的发展定位等;再次,赋予学校充分的办学权力,推进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

可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所以南科大的“风波”就出现了。其实,深圳在南科大宣布筹建时,是有按照上述路径建立南科大的打算的,当地政府官员曾公开表态,要通过深圳人大立法制订南科大章程,可到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只是在去年年中,出台了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没有南科大章程,南科大校长的公开遴选,本质还是政府部门主导;南科大的首届理事会,所有理事全部由政府委任;于是,南科大根本没有办学自主权。由于南科大在现代大学制度方面的探索不力,所以,借鉴港科大注定无疾而终。

在这种情况下,南科大再提出借鉴其他国外大学的办学模式,就更像是“口号”了。而通过这些几乎一年一变的“口号”,公众甚至可能感到朱清时校长的无奈,和南科大被加速“体制化”。一方面,这些口号给人的感觉是,朱校长是说给深圳市政府听的,尤其是最近的提法“不仅是高新技术的研究者,还要成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办学角度说,一个学校要办出特色,首先必须保持独立性,过多地考虑社会经济利益,很可能让大学陷入功利。近年来,斯坦福大学也开始反思,不少人认为学校不注重通识教育,商业味太重。虽然朱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于今年的招生,教育部没有过多干预,但他也一再提到“主要困难是在国内现有体制之下,我们要作的改革遇到了很多障碍”。

另一方面,把大学办成东方的(中国的)某某大学,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官员、学校领导经常挂在嘴边的目标,诸如北方的哈佛、MIT等等。在本世纪初,我国不少大学,都列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还有的大学,就完全按照国外大学的“外形”进行建设。比如,在大学旁边搞一个科技园,欲打造中国的“硅谷”、“128公路”;在学校内部,也比照相关大学设置学科。但是,这只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似”,而不是“神似”。

只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才可能让大学有自身明确的定位,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经验之谈。我国大学发展的难点,就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学校的方式,把办学自主权真正交给大学。

可以说,在这方面,深圳以及我国其他各级政府,并没有作好准备。依照现代大学制度,公办学校将真正成为“公立学校”,政府负有投入的责任,可是却不能直接参与办学,不能直接任命校长,而必须通过大学理事会公开遴选;不得直接指挥学校设置什么学科、专业,这是属于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如果政府部门不作上述转变,我国大学的办学不会出现突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可能是“口号”以及“舌尖功夫”。

清华大学举行纪念钱伟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共同追忆钱伟长的教育生涯——

放弃科研办教育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陈彬

两年前,许丹丹刚刚研究生毕业,那年的夏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档采访钱伟长先生的节目。钱老的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在她眼里,钱老是一位爱国者,是一位科学巨匠。

两年后,许丹丹已经成为钱伟长曾经工作学习44年的清华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所学专业也恰为钱老所从事的力学研究。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钱伟长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许丹丹在钱伟长的同事、亲属的叙述中,又发现了他的另一重身份。

教学可惠及全国

“办教育值得吗?”“值得!”

这段对话来自钱伟长和他的儿子钱元凯。彼时,已是古稀老人的钱伟长,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身给了大学教育。钱元凯问他:“作为一个学者你停止了已自己的研究,每天陷入办学的繁杂事务里值得吗?”钱伟长毫不犹豫地说:“科研项目可以惠及一个学科,教学少则为国家培养成千上万的人,多则成功经验可以惠及全国,值得!”

钱伟长的教育生涯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他担任清华教务长开始的。此后,他的一生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教学里。钱元凯回忆,早在

上世纪中后期,钱伟长便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明确提出了反对理、工分校,反对全面学习苏联教学体制的主张,并特别强调要重基础教育,反对片面地强调专业教育。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根本谈不上“叛逆”,但在当时却超越了很多人的认识水平。

“钱先生在中国时,接受了最好的文化教育,跟钱穆等大家都有密切交往。而在加拿大、美国留学期间,又能够跟爱因斯坦等世界一流学者共同工作,因此,他提出了很多独特的理念,在当时不仅不被大家所接受,还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到现在又大多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座谈会上,上海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这样说。

分析、解决问题并不全面

1983年,经邓小平同志任命,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在这里,他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治学理念付诸行动。

“在学校办学方针上,钱校长在80年代就提出要办研究型大学,但是他提出办研究型大学跟现在有些学校在排行榜上争一流研究型大学有本质区别,因为他提出的是从培养学生培养人才的角度。”周哲玮说,钱老认为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需要的是

创新型的人才,而没有创新能力的教师是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要办研究型的大学。

而在对学生培养的目标设定上,钱伟长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理念。

“钱先生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合格标准有自己的说法。”周哲玮说,一个合格的本科生应对已经成熟并得到系统总结的知识做到无师自通;一个合格的硕士生毕业生,则应该懂得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文献调查、社会调查、现场调查;等到了博士阶段,就是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能够自主地提出最值得研究的课题。

“总的来说,钱先生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们传统的提法则主要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钱先生曾经说过,这一观念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对此,我们是否该有所思考呢?”周哲玮说。

最好的学生是问题最多的学生

当然,作为一位学术大家,钱伟长在从事教学管理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工作。“文革”结束后,曾蒙受不公平待遇的钱伟长终于可以放手工作了,他迎来了自己科研

上井喷式的发展。据钱元凯回忆,在那几年中,钱伟长所撰写的科技论文达到了120万字以上,他曾经兴奋地说,可以做的题目太多了,可以放手大干。

事实上,在科学研究的问题上,钱伟长同样没有忘记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对其作一番阐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曾针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任务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提出“什么叫科学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钱先生说,很多人认为我们需要出一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出一个像相对论这样的成果,才叫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他这么看。”周哲玮表示,在钱先生看来,如果若干年以后,针对我国社会和文化建设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基本仰仗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而不依赖于外国人的话,就可以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完全是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来评价我们的科学。也反映了钱先生的教育理念,那就是始终主张创新,而始终不被条件所限制。”周哲玮说,这就要求今天的年轻学子们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去努力,去创新。“钱先生多次讲过,最好的学生就是那些毕业以后脑子里有最多问题的学生。我们今天的大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用自己的质疑,用自己的创新,去完成老一辈科学家的愿望吗?”